

江苏学者高兆明通过多年研究认为:

# 道德“滑坡”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

年底  
了,各地  
相继要评  
选出“道  
德模范”,  
目的是以  
“树典型”  
和“宣传

模范事迹”的行政方式改变道德的状况。但长期以来,道德状况却并未因行政的奖励和宣传而变得更好,不管是轰动一时的“小月月事件”,还是拒绝扶起摔倒的老人,道德秩序的失范时刻在拷问我们的道德状况。

问题出在哪里?直到今天,人们对道德失范状况的认识基本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,一是拷问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品性的不足,二是拷问整个社会文化信仰的缺失。

然而,在二十年前,学者高兆明选择了不同的路径,更愿意触及那些隐藏在道德背后的制度和环境状况。他现在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,所撰的《道德失范研究》是最早从制度及其正义的角度切入道德研究的作品,今年6月,在商务印书馆“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”文库下重版。在他看来,道德行为深受日常生活中所能感受的正义状况的影响,如果缺乏制度正义,即公平、平等规则和奖惩分明的制度化标准,社会成员便不能平等地感受到尊严、尊重和自尊,道德失范由此涌现。

## 到制度中 寻求道德状况因果

应该说,道德的失范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,绝对完美的道德秩序从未抵达过世俗的生活世界,而在社会变迁或转型的时期,道德的失范或来得更为猛烈,比如十九世纪的欧洲。工业革命刚落地,经济和社会秩序面临巨大的转变,旧有的道德失去了约束力,却又不能立即抵达新的道德世界。新旧更替的过程,是一段道德乃至整个社会秩序失范的艰难历史。

这种局面,还催生了关注秩序重建的社会学的诞生,也成就了孔德和涂尔干等法国思想家。他们毕生致力于社会秩序的重建。在他们的关切中,除了孔德晚年转向了面向个人的神教,都是在寻求一种制度的和文化的反思与拯救,而制度正是指那些在法律和社会文化中规范化的行事方式。

而在中国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,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所触发的社会转型持续至今。集体主义至上的道德退却,但新的以尊重人的尊严、平等和自由为基调的道德秩序仍未建立,道德的失范不时涌出来。

高兆明以此为他思考的背景,从古希腊文明一路追问下来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探究如何培养好公民时主张,在好城邦中过好生活,做好公民。黑格尔揭示人的品格是人的第二天性,人的第二天性系后天伦理共同体生活的结果。他在被问及如何培育孩子的好品格时借用古希腊人的话说:在有好的法律国家中生活。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社会性本质,还明确要建立一个“合乎人性”的环境,所谓“自由人联合体”就是他心目中的合乎人性的环境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,道德状况的美好只能是一种空想。沿着这一基本认识,高兆明以他的研究方式诊断了那些关于道德失范的认识和困惑。

(本版综合)



高兆明,男,1954年生,江苏盐城人,哲学博士、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。江苏省重点学科“伦理学”学科负责人。南京师范大学重点研究机构“应用伦理学研究所”所长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,尤其是社会伦理及转型期伦理问题研究,并感兴趣于人生哲学、价值哲学、历史哲学、政治哲学、生命哲学等。已正式公开出版个人学术著作18部:《黑格尔〈法哲学原理〉导读》、《荣辱论》、《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秩序研究》、《伦理学理论与方法》、《存在与自由:伦理学引论》、《自由与善:克隆人伦理研究》、《制度公正论》(2001)、《中国市民社会论稿》、《幸福论》、《社会失范论》、《社会变革中的伦理秩序》、《道德生活论》、《管理伦理导论》。并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哲学研究》等杂志正式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70多篇。

## 道德“滑坡”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

笔者:你在书中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研究道德失范,是否意味着转型前的道德状况就好,而是在近四十年来才“滑坡”的?

高兆明:虽然我从转型的角度来看社会道德失范现象,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认定改革开放前的道德状况就是好的健康的。相反,这里有一个基本判断,改革开放前的道德存在严重问题,那时的人性是被扭曲的。

时下,一些人面对社会严重道德失范现象,于是就怀旧,以为改革开放以前乃至“文革”以前的社会道德是好的、清明的。对这种现象应当警惕。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。总体上说,那时的人情感朴素,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简单,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功利性,但是,人性是被扭曲的。朴素、简单的另一面是生命、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一切人间珍贵的东西都可以被轻易蹂躏。

笔者:持道德“滑坡”是转型后才出现的观点,很大程度上是将此归因于市场经济。市场经济造成了拜金主义,致使个人为了私利享受不顾伦理道德;市场经济产生了个人主义,只顾自己而不管他人或集体利益。在你看来,事实是这样吗?

高兆明:尽管社会道德状态与市场经济实践有关,但不能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。

第一,这不合乎历史。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,也有道德败坏、拜金主义、极端自私自利。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社会,未必是道德风尚败坏的社会。

第二,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就没有积极的人文价值?这需要追问。黑格尔、斯密、马克思等思想家对市场经济人文精神的分析很充分,都有自己基本的看法,对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并没有取



对否定的态度,相  
反,还在相当程度上给予积极肯  
定。主体、主体性精神、权利、契  
约、规则、法治、合作等精神,是市场  
经济建设对社会人文价值精神的积极贡献。

第三,市场经济本身作为一种社会  
资源配置方式,无所谓好和坏,但它是  
否健全、法制化和规范化,就有一个好  
坏的问题。如果资本与权力交融一体,  
如果资本本身缺少有效的规范与约束,  
就是坏的市场经济。在坏的市场经济  
中,人们不需要诚实守信、不需要通  
过利他而利己、不需要契约精神。只有坏  
的市场经济才败坏社会风气。坏的市场  
经济,这才是现时需要特别警惕的问题。

## 制度正义是现代化的方向

笔者:制度的正义一定是各种要素  
统一作用的结果。但如果从人的角度谈  
这个问题,公平与正义要实现,在你看  
来最值得关切的什么?

高兆明:如果从主体、主观的角度来  
认识问题,也有诸多方面。我简单点从社  
会分层的侧面来说。一个社会可以分为大  
众和精英。社会的文明进步,两者都有要  
求,如果少了其中任何一方,制度正义建  
设就不可能。

它需要精英分子的理想、良知与无私  
精神。如果精英们利用自己垄断的资源,  
图谋私利,正义制度的供给谈何容易。如  
果相反,精英们能够“承认”社会所有成  
员的平等身份、人格、尊严,并以宪法法律  
的客观方式确立,那么,就较为容易。信仰、  
理想、良知,当然每个人都要讲,不过,首

先是社会精英分子要有信仰、理想、良知,  
要公天下,而不是私天下。

作为大众,我们每一个人不能置身度  
外。我们都是局中人,不能指望别人替我  
们建立起一个新世界,然后再去变得纯粹  
一点。马克思强调改变主观世界与改变客  
观世界的统一。世界是丑陋的,我们自身  
也好不到哪里去,需要改变世界,也需要  
改变自身。

笔者:这本书的研究,是你在二十  
年前就做的。你非常注重历史感,置于社会  
转型角度把握,对转型时期的“非常态”道  
德失范和任何时代都存在道德问题的“常  
态”做了严格的区分,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  
你是否有过新的体会或感触?

高兆明:经过这么些年的实践,尤其  
是放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大背景

中把握,现在对问题的认识变得更为不  
安。“非常态”向“常态”过渡或转化,有两  
个可能方向。一是在全社会形成新的道德  
价值精神,克服道德失范现象。这是一些  
成功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民族所经历的  
成功路径。这是一种常态。还有另一种演  
变方向,即既有的“非常态”本身变成了  
“常态”。这就很可怕。在现代化过程中,我  
们是否能够成功避免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这  
是极为严肃的现实问题。当下,这个问题  
越来越尖锐,有强烈的现实危机感。

时间越来越紧迫。如果这些道德失范  
现象本身真的成为常态,我们这个民族的  
未来、前途究竟怎样?令人忧心。在这个意  
义上,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,一个民族的  
民族精神建设有一个“时间窗口”问题。我  
们不能错过“时间窗口”。